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

主编

王亨通
杜斗城

兰州大学出版社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

主编

王亨通
杜斗城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杜斗城,王亨通主编.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8

ISBN 7 - 311 - 02855 - 8

I. 炳... II. ①杜... ②王... III. 炳灵寺石窟-资
料-汇编 IV. K87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5532 号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

杜斗城 王亨通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4.5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28 字数:33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ISBN7 - 311 - 02855 - 8/K · 331 定价:82.00 元

数字资源
PDG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序

马少青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在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等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八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即将付梓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炳灵寺石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我国六大石窟寺之一。根据史书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晋初年,保存在炳灵寺第169窟中的“建弘题记”是我国石窟中目前保存最早的纪年题记。大量的史料和文物遗存充分证明炳灵寺石窟兴起于十六国时期,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吐蕃、西夏、元、明、清等十余个朝代,历时1700余年。目前保存在炳灵寺石窟的窟龕216个,各类佛教造像800余尊,各个朝代的壁画1000余平方米,碑文题记120余处,此外炳灵寺石窟中还珍藏着馆藏文物400余件。炳灵寺的历史概括地讲,兴起于十六国的西秦时期,北魏时达到第一个高潮,盛唐时达到巅峰,唐中期以后慢慢走向衰落,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开始在炳灵寺大兴,至清朝康乾盛世时达到高潮。清朝同治战乱之后炳灵寺开始慢慢归于沉寂。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炳灵寺石窟的工作十分重视,1955年5月成立了炳灵寺文物保管所,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了保护范围。工作人员由最初的两人增加至现在的二十多人。工作性质由原来的“看门子、守摊子”,已经上升为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资料工作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做资料也就是摸家底,只有将家底彻底摸清了,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应该说,炳灵寺从重新发现的那一刻起,对炳灵寺石窟的调查、勘察、

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今天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在前辈们艰苦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不能不缅怀和感谢为炳灵寺石窟作出过贡献的前贤们。

1951年10月,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与当时的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同志,利用在临夏搞土地改革之机,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他的考察报告先后在《甘肃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52年9月,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抽调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炳灵寺石窟考察团,由赵望云任团长,吴作人、常书鸿任副团长共13人对炳灵寺进行了第一次勘查。这次勘查工作引起了全国瞩目,得到了甘肃省政府邓宝珊主席和省委孙作宾副书记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此次勘查中,共发现了36个窟、88个龕,其中佛像153尊,菩萨像265尊,天王像14尊,比丘8尊,石刻碑文5方。在考察过程中临摹壁画和拍摄照片173件。考察结束后,在北京举办了考察成果展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和高度重视。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印出版了由郑振铎同志写序的《炳灵寺石窟》一书。同年,在《文物资料参考》第一期上刊登了这一次的考察报告。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考察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仍有其局限性。尤其是最著名的169窟(当时称天桥洞)未能攀登。

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今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与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一起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全面细致地做了洞窟内容记录、摄影、重点洞窟测绘和窟龕编号工作。这次考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统计窟34个,龕149个,比第一次多61个,共183个,加上洞沟8窟和上寺2窟2龕炳灵寺石窟已发现的窟龕已达195个。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是考察队员们通过架设云梯终于登上了天桥洞即编号169窟,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墨书题记。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石窟中保存最早的纪年题记,这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建造年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对全国石窟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文物》杂志1963年第十期发表了《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简报),详细介绍了第二次考察情况和新的发现。

1963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石窟寺专家阎文儒先生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在甘肃省博物馆乔今同、临夏学者张思温先生的协助下,在炳灵寺石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他将调查结果编著成《炳灵寺石窟》一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集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身,对炳灵寺石窟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以上所提到的人员,有的已经作古,活着的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为保护和研究炳灵寺石窟所作出的功绩是我们永远值得铭记的。

1995年,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组织专业人员,对石窟群以外的零星洞窟进行了调查,在原195个窟龕的基础上又发现了21个窟龕,至此,炳灵寺石窟的窟龕数目达到216个。从1997年起,炳灵寺文管所在省文物局的统一规划下,开始着手内容总录的工作,按计划每年以40个窟龕的速度向前推进,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组织专业人员上洞窟测量、记录,然后讨论定稿,至2002年完成了所有窟龕的全部文字记录工作。从2002年起,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杜斗城教授的亲自带领和指导下,五易其稿,终于在2004年使《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基本定稿。

写到这里,使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领导这项工程的青年学者、前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亨通先生,在这项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他却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工作岗位,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炳灵寺失去了一位难得的领头人,国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文物工作者,这本书能够出版与他前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谨向他表示最深切的怀念。同时,我也对为这本书付出心血的作者们、编辑们以及支持过和关心过这项工作的同仁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内容总录工作的完成,对炳灵寺石窟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存的国宝单位来说只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以后的工作还很多、很艰巨,希望炳灵寺文研所的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炳灵寺这块文化宝地上为国家的文物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序

苏国庆

由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前任所长王亨通先生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教授共同主持编写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今天终于同学术界见面了。作为主管甘肃省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负责人,我对此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对二位先生及参与此项工作的王世儒、曹学文、姜涛等同志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城西南约35公里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河湟地区的佛教中心,也是我国最早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而开凿的石窟寺之一。现存窟龕216个,壁画约1000平方米,造像近800尊。虽其开窟规模略逊于敦煌、龙门、云冈三大石窟,但其保存价值和艺术魅力与上述任何一个石窟相比,都不逊色。特别是169窟西秦时代的造像和壁画,反映了我国早期佛教艺术风格的特点,为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我国其它石窟所无法比拟的。

关于炳灵寺石窟开凿的确切年代,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据现存于169窟北壁的“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墨书题记,可以推断炳灵寺石窟的始凿年代不会晚于西秦建弘元年之后。此后,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各代都曾在此进行过开凿和修缮,前后延续了近1600年之久。可以说,炳灵寺石窟是一座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的艺术博物馆。

但是,在经历了近160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炳灵寺这座佛教艺术宝库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再不堪忍受任何自然毁损和人为破坏了。为了保

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组建了“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结束了炳灵寺石窟长期以来无人管理的状况。从建所至今,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系统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使这座中国佛教和石窟艺术的宝库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炳灵寺石窟的勘察和研究工作始于50年代初。1951年秋,冯国瑞先生对炳灵寺石窟作了初步调查,并发表了《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使这一被遗忘的艺术宝库重现光芒,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随后,中央和甘肃省的有关部门又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一次是1952年,文化部组织国内著名的艺术、考古工作者进行了第一次全面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有些重要洞窟未能攀达。第二次考察,是1963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共同组织的。此次考察对部分洞窟做了记录、摄影、测绘和编号工作,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此外,北京大学阎文儒先生1963年也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考察。

上述考察活动,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对炳灵寺石窟的了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石窟的研究工作,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阎文儒、王万青先生所写的《炳灵寺石窟》;国家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共同出版的《永靖炳灵寺》;王亨通、杜斗城先生主编的《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彦廷亮、王亨通先生主编的《炳灵寺石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张宝玺先生主编的《昔日炳灵寺》等等。但这些成果都不能全面反映炳灵寺石窟的内涵。

现在出版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对炳灵寺各个窟龕的年代、形制、窟内造像和壁画的具体情况以及洞窟的现状作了详细的介绍,不但为炳灵寺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较为全面准确的档案资料,而且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炳灵寺石窟基本情况的综合成果,是国内外炳灵寺石窟研究者期盼已久的一本参考资料,必将对炳灵寺石窟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 言

炳灵寺石窟是我国著名的石窟寺之一，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并称为中国六大石窟寺。炳灵寺石窟群主要由下寺区、上寺区、洞沟区三部分组成，现存自西秦至明清时代的窟龕共计 216 个。有题材丰富、技艺精湛的雕塑 800 多尊，色泽鲜艳、绚丽夺目的壁画 1000 多平方米。这些雕塑和壁画历经西秦、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传承 1600 多年。既有汉传佛教的艺术特色，又有藏传佛教迥异的艺术风格，这是炳灵寺石窟不同于其它石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炳灵寺众多的窟龕和壁画中，历史最为久远、最为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要数洞窟位置最高的 169 号窟。其中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的石窟寺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造像题记，相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最早造像题记还要早 100 多年。这条墨书题记的发现，不但为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全国现有石窟中唯一的年代断代标尺。除此之外，炳灵寺其他的窟龕壁画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融宗教、艺术、考古、科研等知识为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甘肃省文化局于 1955 年 5 月批准成立了“炳灵寺文物保管所”，选派王万青等两位同志驻所工作，自此结束了炳灵寺石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况。王万青等前辈在炳灵寺工作近四十年，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与鸟兽为邻，默默地守护着沉寂的炳灵寺，为炳灵寺日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公布炳灵寺石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8 年，为了避免刘家峡水库对石窟的影响，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洞窟前修建了防护堤坝，至今仍在使使用。上世纪 70 年代，在省上的大力支持下，我所集众人之力，恢复了石窟的木质栈道，并拉专线解决了照明问题；80 年代，国

家批准炳灵寺石窟为对外开放文物单位后,又修建了相关的文物保护和旅游设施,建起了职工宿舍,为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在国家及省上领导的关怀下,炳灵寺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也突飞猛进。1993年,王亨通同志继任所长,以石窟为家,努力工作,兢兢业业。在其主持下先后完成了石窟岩体的加固、防渗水、防风化、防病害等保护措施,以及加固栈道、完善文物监控措施等工程,使炳灵寺石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2004年9月17日,亨通同志因操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这是炳灵寺文物保护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新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任何懈怠。先后完成了兴建环形栈道、步行桥、护岸码头、广场绿化、游客服务中心和山门等炳灵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旅游环境,景区面貌焕然一新。还完成了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实现了人、技一体的安全值班系统。我们将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工作,开拓进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炳灵寺石窟的保护研究和旅游开发事业更上一层楼!

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一直备受各级领导的关怀,1968年修建刘家峡水库时周总理对石窟保护作出了重要批示;1983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及杨静仁、肖华、王兆国等领导同志视察炳灵寺,随后,邓力群、廖汉生、伍修权、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陈慕华等同志相继视察炳灵寺;199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的陪同下到炳灵寺指导工作。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今天的炳灵寺石窟恢复了原来的历史面貌,吸引着海内外各界人士前来观光考察,成为弘扬我国历史文化的窗口。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为炳灵寺石窟的宣传和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1年,冯国瑞先生对炳灵寺石窟作了初步考察,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随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组团考察活动:第一次是1952年9月,由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组成“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对炳灵寺石窟勘察后出版《炳灵寺石窟》一书;第二次是1963年4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组成的考察团对洞窟进行了比较全面地测绘、摄影、记录和窟龕编号工作,发现了重要的“建弘元年”题记,为炳灵寺石窟的考古

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纪年资料。此外,1963年和1994年,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先生和宿白先生也前来炳灵寺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推动和促进了炳灵寺石窟的学术研究,出版了以炳灵寺为主题的学术专著近十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百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美中不足的是长期以来炳灵寺石窟尚未有一部完整翔实的石窟内容总录,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不便。鉴于此,我所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及博物馆学系合作,历时两年编写了这本《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在编写过程中,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不畏寒暑艰辛,在繁忙的教学间隙挤时间数次来炳灵寺石窟进行实地勘察,并带领研究生姜涛、党燕妮、郭永利、翁鸿涛、梁红、王艳玲、杨君、尹燕、彭建兵、崔峰、许栋、王慧慧等对洞窟逐一进行记录,有时在炳灵寺一住就是十余天,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在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和我所同志们共同的努力下,完成了眼前的书稿。书稿经马世长、张宝玺等前辈学者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们希望本书能够起到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方便之用。

以上种种保护措施以及研究成果,都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各方专家的通力合作下,在我所以王万青、王亨通为首的两代文管所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下取得的,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缅怀和敬意!

特别要说明的是,亨通同志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曹学文、王世儒同志也作过许多基础性工作,今天此《总录》能够付梓出版其功不可没!此《总录》虽博采先贤之长,力求完善,但因时间太紧,故错误难免,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石劲松

2006年6月6日于炳灵寺

目 录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	(1)
炳灵寺石窟上寺区内容总录	(237)
炳灵寺石窟洞沟区内容总录	(246)
五十年以来的炳灵寺石窟研究	(252)
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	(263)
炳灵寺石窟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	(272)
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发展之述评	(286)
炳灵寺明代壁画艺术初探	(303)
永靖炳灵寺大事年表	(309)
测绘图	(335)
图版	(365)
后记	(392)

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

第 1 龕

位置:位于大寺沟口,姊妹峰根部的崖壁上。

时代:西秦,明代重修。

形制:摩崖龕像。

尺寸:选址在高 5 米的洞穴内。

造像:西秦原塑一立佛像,明代改制为一佛二菩萨像。

西秦立佛,高 4 米,石胎泥塑,波发,肉髻高大,面部方圆,两颊丰满。两眼广长,鼻宇高直,着通肩袈裟,衣褶作有规律的双刻线纹。小臂及两手残断,似为施无畏、与愿印。与第 169 窟 7 龕西秦臂断立佛的情况相同。在高度上与 169 窟 18 龕西秦立佛等高。通身彩绘,躯体为白色,佛衣红色,身光不存。

明代重塑一立佛二菩萨。佛头饰螺发,加顶严,面方额大,额际有毫光,颈部塑三道纹,着袒右偏衫袈裟,下臂及手部残失,立于莲台上。二菩萨像离开崖壁,非石胎泥塑,立于佛两侧。皆头束发髻,秀发披肩,袒上身,双肩搭披巾,下着裙,身材细高。

壁画:西秦壁画,在立佛身侧下方,似为供养人像,右侧下方绘一僧,比较清楚,余者漫漶不清。左侧下方似为一僧,但模糊不清。

明层壁画,佛像左右侧下方绘二菩萨像,其上部画僧人,均已模糊不清。

题记:无。

现状:西秦立佛于 1967 年搬迁过程中清理出来后,由于为石胎泥塑

像,不易搬动,保护难度大,加之正值“文革”,放弃处理,未作测绘图,仅存照片,1968年刘家峡水库蓄水后被淹没于水下。

第2龕

位置:在睡佛沟南侧关山崖上,距地面高约10米处。

时代:北魏,唐重修。

形制:摩崖敞口龕。

尺寸:龕高3.17米,宽3.70米,深2.41米。

造像:龕内泥砌坛基上塑释迦多宝二佛及二菩萨像。坛基高0.74米,正壁坛基宽0.75米,东西两侧宽0.45米。

释迦佛像(东侧佛)高1.13米,多宝佛像(西侧佛)高1.09米,均泥塑尖拱形项光,磨光肉髻,面相清秀,眼角细长,嘴角微笑,细颈,内着僧祇支,外着双领下垂袈裟,双手均残缺,并排半跏趺坐于悬裳座上,座高0.41米。

东侧菩萨像高1.36米,泥塑圆拱形项光,圆形发髻,中间匝一巾带成束腰形,面相清秀,薄唇,细颈,戴三角形项圈,秀发波浪状垂至双肩,披巾于腹部交叉,下着羊肠大裙,右手举于肩侧,手心向外,手持摩尼宝珠,左手扶在左胯处,持物不明,赤足立于半圆台上,台高0.10米。

西侧菩萨像头缺失,残高1.05米,服饰与东侧菩萨同,右手下垂至右腿处,提净瓶,左手举于肩侧,手持莲蒂,赤足立于半圆台上,台高0.11米。在半圆台之下坛基拐角处悬塑狮子(已残)。

壁画:在释迦佛像脸部和两侧菩萨身上明显看出有重层壁画,有叠压关系,底层壁画显露土红色。

释迦佛像项光上彩绘六圈图案,最外边的一圈似莲花,顶部正中绘一立佛,其前盛开一朵花,彩绘颜色以石绿为主。佛身上均无彩绘。

多宝佛像项光彩绘有2圈图案,里圈花卉图案,外圈绘火

焰纹。顶部正中绘一朵莲花,莲花正中有一坐佛。两尊佛共用一个身光,身光上只涂 2~3 圈不等的红色纹线。两佛两侧分别彩绘弟子像。

东侧菩萨项光上绘水波纹,其左侧绘 2 身供养菩萨像。两身菩萨像身上无彩绘。

题记:正壁 2 佛中间有 17 行刻画藏文题记。在佛、菩萨中间的壁面上刻划零散的藏文题记及刻划喇嘛塔 8 座,刻划的非常乱杂,没有规律。在东壁靠近窟口边沿刻划汉文题记:壬戌/四月二十日,其下边刻划四排藏文题记。

现状:释迦多宝佛像保存基本完整,但双手均缺失,鼻尖残。东侧菩萨保存完整,但右耳残;西侧菩萨头部缺失,腹部及双手有残损,其余部位保存完整。坛基根部缺失。龕顶壁画已经脱落无存。

备注:释迦像头部于 1993 年 6 月粘接修复;多宝佛像头部不是北魏原作,为北魏以后补塑。佛的泥塑项光,壁画均为后代重绘,重绘时间大约在唐代。

窟门为 1993 年制作安装。

第 3 窟

位置:在炳灵寺窟区最南部。

时代:唐代开窟造塔像,明代重绘壁画。

形制:平面基本呈方形,平顶。

尺寸:高 3.52 米,宽 3.40 米,深 3.10 米。

造像:窟内正中造一石塔,塔四披作仿木构斗拱结构,三珠宝冠式塔顶。冠内覆钵涂棕色、山花蕉叶绿、蓝、黄色,圆点花纹。塔高 2.23 米,塔基宽 1.40 米,纵长 1.39 米,正面(西面)凿一方形深龕,龕外两侧各彩绘一结跏趺坐佛,佛左右石栏上画两胁侍菩萨。龕下两侧为天王像,中为供养人(皆模糊不清)。龕上分两层六栏绘画,正中下栏两侧绘宫殿式建筑各一,内绘结跏

跌坐佛。塔正面上部斗拱下分三栏,中已不清,两侧禅定比丘,斗拱之下的鞠额上墨字不清。四柱间有彩绘,门框墨绘极细忍冬纹,大部脱落。

南壁(右壁)正中绘文殊骑狮,有牵狮人(于闐王),狮后一菩萨作供养状,狮前善财童子作礼拜状。两侧上部一比丘、一老者(应为佛陀波利),此为“文殊五尊”。“文殊五尊”下正中绘一阙形建筑物(似大门),门左(东)绘一龕,龕中绘一兽头力士,足踏黑兽,旁立一左手持三股叉、右手托银锭小鬼。门右绘五台山中一台,其余四台绘于“文殊五尊”上方。此外,全壁通绘千佛,从上到下分二十层。最上部塔檐下中绘一结跏趺坐佛,手捧宝物,两边各绘一藏僧。鞠额上绘十一尊坐佛。

西壁(后壁)正中绘一水月观音像,游戏坐于巨石上,观音右侧立一持剑童子,左有奇石,上栖鸚鵡,红嘴圆眼,石旁植竹,后有祥云。石左置黑钵,右碗中放净瓶,中插柳枝。观音左下侧绘一俗人,持笏,后立一比丘。观音座下绘水中莲花等。观音右下侧绘一赤足礼拜善财童子。余全壁通绘千佛,千佛共二十层。最上塔檐下,正中绘一藏僧,两边各一大成就师。

北壁(左壁)塔中绘普贤菩萨乘白象,戴五智冠,面已毁,双手于胸前结印,颈、饰璎珞两条,棕色皮肤,裙淡红色,坐粉绿莲座,白象四足踏红、绿、白云作行走状。象下一象奴,粗眉大眼,作驾驾状,随象奔走。普贤画于圆圈内,四周白云缭绕。上方二角有二坐佛,下方绘一结跏趺坐佛及二护法。余通壁绘千佛,共二十层,每层画19尊。最上部塔檐下,中绘一结跏趺坐佛,两边各绘三面八臂菩萨。鞠额上画十一尊坐佛。

塔基正面凿十层阶梯,塔基左右分三栏绘画,绘画内容不清。

南壁上下分别开一半圆形小龕,上龕高0.70米,宽0.70米,深0.25米,距地高2.60米,无坛基,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立于圆台,内着僧祇支,外披袈裟,左手托钵于胸前,右手提巾角。佛左为弟子迦叶,右为阿难。右胁侍菩萨,左手托

珠于腹前,右手下垂,左肋侍菩萨,双手捧红珠于腹前。下龕高1.16米,宽0.73米,内原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现二弟子已失,以壁画代之。佛面相丰圆,披绿色袈裟,右手捧钵,左手抚膝,跏趺倚坐于台座上。左菩萨发髻已毁,右手持莲蕾于胸前,左手下垂,戴项圈、臂钏、手镯。右菩萨高发髻,戴臂钏、璎珞、手镯,左手托钵于腹前,右手提巾横于膝前,两菩萨均赤足立于圆莲台上。

壁画:正壁:正壁(西壁)左右各绘一结跏趺坐佛与二肋侍(南侧佛肋侍为菩萨,北侧佛肋侍为弟子),佛背光内绘供养弟子与供养菩萨等。下部壁画已不清,上部分三层,上层南起绘二结跏趺坐佛、一菩萨、一居士、一四臂菩萨、二藏僧、二欢喜佛,共九身。第二层画二十七尊坐佛。三层分左右二部分,左部画一结跏趺坐佛,两肋侍菩萨,头光外各绘一象,头光正中上部绘金翅鸟,两侧羽人,坐十大弟子(一边五弟子)。金翅鸟顶坐佛一尊,顶生莲花,莲花两侧再绘两佛,有化生童子、经幢、河溪、莲花、荷叶及鸳鸯、大树、楼阁,应为极乐世界。佛周围绕六佛。右部亦画一结跏趺坐佛,二弟子侍立,头光外也各绘一象。佛上部南侧绘一结跏趺坐佛,双手于腹前托钵;北侧为一结跏趺坐佛,双手于胸前结印。其周围分十一单元绘故事性壁画,每幅绘一中心人物,顶部从南至北1~5,南6~8,北9~11,内容如下:

1. 番僧罗汉像,松树之下倚几而坐,袒上身,斜披白巾,着宽裤,座上衬布,左手执金刚杵,支颐,右手持铃,置于膝,一猴捧七宝盒于右,白象备鞍左卧。

2. 一僧人,着袒右肩袈裟,倚坐于太师椅,双目前视,赤足踏绿色木榻。弟子绿衣束带,执锡杖侍立于左,一戴盔着甲武士,手捧盘跪于僧人前,盘盛宝珠,珠上有火焰,四周绕白云。

3. 苦行僧,有头光,白衣白帽,大衣束带,手结禅定印,跏趺坐于束腰石台座上。背后为石山,两侧有修竹,白鹿衔芝于右,二童长发,裸上身,下着绿裙,手捧桃果作供养状。

4. 一梵僧,坐于石榻,着袒右肩袈裟,白色项光,红云绕